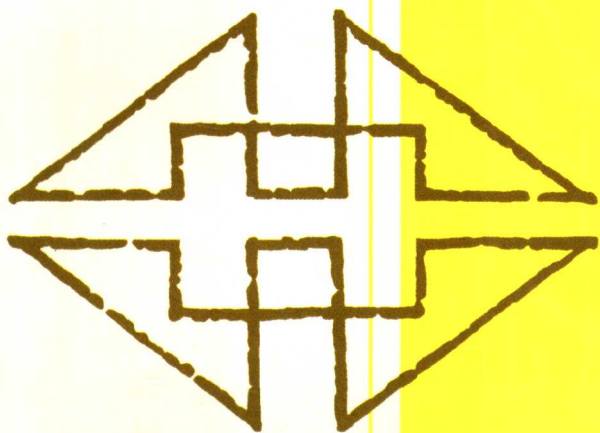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论丛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 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论丛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论丛
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编

出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邮编：610054）

责任编辑：汤云辉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四川建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9375 字数 224 千字

版次：1997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81043—872—7/G·81

印数：1—1000 册

定价：13.80 元

目 录

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	(1)
也谈中国神话的系统问题·····	(17)
隐逸精神与社会理想·····	(26)
《诗经·桧风·隰有萋楚》原始·····	(39)
屈原沉江疑说讨源·····	(46)
《史》、《汉》纪传异同略论·····	(55)
魏晋文人精神境界论·····	(67)
论郭象注《庄子》的消解策略·····	(76)
任昉诗歌小议·····	(90)
儒家诗教与唐初诗论·····	(99)
论张说的重道尊儒·····	(111)
北宋的书禁与《青琐高议》·····	(122)
杨立端考·····	(133)
徐渭的人格理想·····	(137)
四库馆臣与词·····	(149)
江有诰《墨子韵读》补正·····	(163)
周永年与《先正读书诀》·····	(172)
论李调元《方言藻》在诗词训诂学上的贡献·····	(179)
游记体小说的近代化·····	(190)
中国古典美学的中间范畴·····	(202)
邓椿及其绘画理论探析·····	(214)
谢榛审美体验论的现代诠释·····	(227)
陆时雍的审美境界论·····	(240)

方董绘画美学思想初探·····	(257)
“孟劳”考·····	(267)
高师素描教学的特点·····	(275)
后记·····	(279)

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

——由成都平原考古所引发的对古代文献的新思考

李 诚

如若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只是悄悄地撩起了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那么1996年下半年以来中日两国考古工作者对成都邻近地区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的发掘和考察,则似乎初步勾勒出了古蜀文明大致的轮廓,从而更加揭示出它深邃而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历史文化内涵。^①

19世纪后期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对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及其他古希腊文化遗址的发现,与荷马传唱的史诗《伊利亚特》交相辉映,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古希腊历史;而19世纪前期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则架起了后人通向璀璨夺目的古埃及文化的又一道桥梁。史前古城址、古代文字、口头传承和文献典籍中所载神话与历史传说这三者,或许是任何一种古老的文明系统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几个支撑点,而这几者在古蜀文明中都已具备。论古城址,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和近来发掘的温江鱼凫城等,其年代都在四千年前,远远早于古希腊的特洛伊城;论古文字,则古巴蜀图语的存在已为专家所公认,^②正期待着当代中国的“商博良”破译;论神话与历史传说,则现存古代文献典籍中有关古蜀文明者具在,已传两千年以上。与既往不同的是,随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的陆续发现,使我们对这些古代文献典籍中所载与古蜀文明有关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有了新的

审视角度和思考,并进一步引发了对古蜀文明与古代华夏文明之间关系的新的思考。

一、古蜀文明的地域和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曾记载过一个充满神话和农业文明色彩的国度:“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苾、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神秘的国度,晋代学者郭璞认为即西汉扬雄所撰《蜀王本纪》中“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的“广都”。其具体地望,就在今天几乎已成为成都市郊区的双流县。^③证之以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上述结论应该是可信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成都平原发现史前古城址的几个地方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都江堰正处岷山山系与成都平原的交接之处,岷江由此汨汨滔滔,流向成都平原;以今日图上距离衡之,都江堰市东向约50公里,是广汉三星堆遗址;都江堰市南向约70公里,是发现宝墩龙马古城的新津县;新津县与三星堆之间,也是约70公里。在这个约二千平方公里的三角区域内,除了都江堰市、新津县、广汉市三星堆,在成都市、郫县、温江县、双流县等地也都发现了史前古城址或史前文化遗址,可以说,饱含古蜀文明的遗存。岷江由北向南,正流经这一区域的边缘。因此《山海经》所称“都广之野”无疑正指这个三角区域及其周边地带。

当“都广之野”的测定得到地下考古支持后,我们不由得将眼光投向上面我们已特别提到的“岷山”、“岷江”。“岷山”与“岷江”在古代文献,无论是儒家经典中,还是稗官野史中,无论是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言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都相当高而且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因为从现存古代文献来看,西周以来(其实依现在来看,应当认为是殷商以来),人们心目

中的古蜀之地乃偏远蛮荒之域。人们错将殷商以来古蜀的偏远蛮荒拿来推定了殷商以前古蜀的文明状态，因此古代文献中的“岷山”、“岷江”等不过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地理词汇。而今天，随着成都平原一系列史前古城址和其他充满高度文明的史前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知道了，殷商以后人们所认为的古蜀的偏远蛮荒，不过是古华夏文明中心由岷江、长江上游向中原与长江中游转移的结果。古蜀虽然由此而偏远了古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实从未蛮荒过。当然还不仅止此，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岷山”、“岷江”等词汇在古代文献中的大量存在是自有其文化渊源的，虽然使用它们的人当时就已不清楚这种渊源。近现代已不断有学者猜测传说中黄帝、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实即岷山，那么换句话说，若从神话学角度看，中国神话中大约与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相匹的众神之山是昆仑或即岷山。^④古代文献中记载西部边陲山中有“日月山”，天帝在此命令重、黎二神把天地分开，使天地人神判然划分，不相杂糅；又记载这里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⑤描绘出了“十巫”来往天上人间的壮观景象。古蜀文明传说中的第一位蜀王蚕丛即“始居岷山石室中”，死亦葬以“石棺”“石槨”；另两位古蜀王鱼凫与杜宇最终“仙去”“隐焉”的地方亦皆在此山系中，^⑥似有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的深义存焉。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对众人宣告，岷山是天的旁门（天彭门），死去的人灵魂皆由此升天，既而至山中岷江之源，于水上立祀三所，祭祀天神、江神以求治水成功。^⑦

既如上述，岂不是说，古华夏文明中极其重要的篇章——它的神话传说——竟是在古蜀文明的西陲岷山中翻开其首页，且是与其历史传说孪生的？岂不是说，古华夏文明主要的根柢竟在这岷山之中？

或许我们不必性急地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至少，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史前城址和遗址的被发现，古代文献中的“岷山”、“岷

江”有了崭新的意义，我们仿佛看到，数千年前，一支古代部族从岷山中走出，循着岷江，通过今天的都江堰市、彭县等地走向了成都平原，从而开拓发展了直到今天仍被称为“天府之国”的“都广之野”亦即成都平原，并进而循着岷江、长江、汉水等将古蜀文明播迁向四方……由岷山、岷江而“都广之野”，这或者就是古蜀文明孕育诞生的主要区域。

古蜀文明形成的时代，是我们关心的又一问题。按目前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时间坐标：古蜀之始，“周失纲纪”，方有蜀侯蚕丛的“始称王”；古蜀之末，则“周慎王五年秋”“开明氏遂亡”。以常情度之，所谓“周失纲纪”，最早也只能推及公元前 771 年即西周末年，而“周慎王五年”乃公元前 316 年，也就是说，按《华阳国志》的记载推算，从“死，作石棺、石槨”的蚕丛王到柏灌王、鱼凫王、望帝杜宇、丛帝开明直到开明十二世，才四百四十五年时间。这一推算结果与《华阳国志》一书自身的许多记载是不相吻合的，与其他古代文献典籍所载是大相径庭的，与成都平原的考古实绩也是完全矛盾的。考古的结果告诉我们，温江鱼凫古城的兴建乃在四千多年前，亦即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而文明进化史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发明和农业文明的形成更当在此前，且本身即一漫长的历史过程；而神话传说（包括《华阳国志》自身所载）又告诉我们，古蜀文明中发明了农业，被古蜀人民尊崇为农神的人是望帝杜宇。由此而言之，杜宇的时代距今至少也在四千年前，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考察已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⑧而蚕丛、柏灌、鱼凫等数王更当在杜宇之前。《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李白《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云云，虽非确数，且亦难免文人夸饰，但却显然是以一定的神话传说为基础，有其历史投影的。《华阳国志》对古代文献典籍与口头传承的材料加以整合，将古蜀文明硬塞进东周以来的历

史框架中,不能不造成一些削足适履、矛盾丛生的情况。现在随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的出土,我们不仅可以将古代文献典籍中所涉及到的古蜀文明置于一个相当广阔同时又相对准确的空间上加以研究,同时也可以将其置于一个至少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且距今数千年的时间上加以研究。换言之,过去在空间上相当模糊,时间上过份紧缩的古蜀文明,现在应当被扩展伸张开来加以思考。这样,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曾以其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煊赫辉煌的巍巍帝国就会浮现我们眼前。这也就促使我们不能不如前已提到的,更加要注目古蜀文明在建构整个古华夏文明中的地位与二者的关系。

二、古蜀文明与岷江长江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岷江在古代文献中并不鲜见。从“岷山导江,东别于沱”^⑨到“江水又东别于沱”,^⑩触处皆可见出,古人自来是将岷江视为长江之源的,这种看法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今人虽以精确的地理学考察指出了长江之源并非岷江而在青海省境内沱沱河,但自然科学的这种精确却不能用以指责人文科学的真实。认岷江为长江之源绝非古人疏懒而不谙地理的结果,倒毋宁说,它执着地反映了一种经历数千年而积淀下来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集体潜意识正是高度发达的史前古蜀文明的存在与流播所造成的。

岷江自岷山中发源,经都江堰流成成都平原,入于蜀南之乐山(古称南安),再入于宜宾(古称犍道),汇入长江。自岷江至长江中游,古蜀文明播迁之迹触处皆是。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有鱼凫古城、鱼凫墓;沿岷江南下,彭山县、乐山市古皆有“鱼涪津”;^⑪长江以南,叙永县至今仍有“鱼凫乡”,传说为鱼凫王逗留之地;屏山县某土司家谱竟指鱼凫为其先人;^⑫沿长江而下,合江县古有“巴苻关”;^⑬南溪县今有“鱼苻津”;奉节县则古称“鱼复”或“鱼腹”。^⑭不

仅如此，西陵峡至鄂西红花套等地出土的鸟嘴状把勺竟与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约当夏至商代中期）所出土者高度一致，让人惊讶，被认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⑭

当然，仅就上述情况而言，到底是古蜀文明东迁还是形成古蜀文明的某种因素西来，是不能够遽然做出定论的。但是有了成都平原上的考古成果，我们已是在前述古蜀文明广阔的空间和绵亘的时间背景下来讨论上述问题，问题的结论当不言而喻：传说中的鱼凫王或一支信仰鸟图腾的部族曾在夏、商之际或更早时候顺岷江、长江由西向东迁徙，正是这种迁徙造成了成都平原上以农业经济为特色的古蜀文明在巴蜀各地甚至巴蜀以外地区的影响。楚民族崇拜鸟图腾，^⑮或与此亦有着尚待揭示的重大关系。

同样，在此背景下探讨其他问题，结论亦不难得出：夏禹生于岷山山系中，^⑯治水自岷山、岷江之始，^⑰沿江而下，又治水于三峡并娶于江州（今重庆市）涂山，有庙存焉。^⑱江有江神，为帝女之灵，“盖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⑲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祭祀于岷江之源，果然能得其相助。^⑳这位江神又出现于三峡，称巫山神女，不但助禹治水，^㉑且朝云暮雨，世世享受着楚民族的祭祀，被视为楚民族的高谋之神，^㉒益发说明了古蜀文明与楚民族的密切关系。就是李冰治水的故事也值得深思。李冰在蜀治水，以《史记》、《华阳国志》等诸书所记，不外兴修农田水利与浚通航道二事。我们如若从当时秦楚争霸中蜀和巴的战略位置观察，就会知道秦的取巴蜀，意图本在谋楚，诚如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所言，“得蜀则得楚”。^㉓因此其时蜀守的基本战略任务也在此。李冰治水，岂能不首先顾及之？史载李冰于南安（今乐山市）凿离堆，疏通岷江，在犍道（今宜宾市）火烧蜀王兵阑（江中大石滩）都是此意。不过都江堰的兴修既已有之，以农业经济与水利的密切关系，加上传说的时代早已逝去，战国时代的刀光剑影也已冷漠，唐宋之际，李冰治水的故事遂逐渐集中于都江堰，农田水利兴建之功完全取代了航道疏浚之

绩。^⑤当然，战国末年早已不是神话传说的时代，但我们如若从古蜀文明播迁这一角度观察问题，那么李冰在南安斗水怪，在樊道烧蜀王兵阑的神奇故事不都粘附着古蜀人民当初疏通岷江、长江航道，将古蜀文明向东播迁的努力的影子吗？

因此，岷江、长江水道在古蜀文明播迁中的作用，在古华夏文明建构中的功绩，随着成都平原考古的收获，理应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三、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

约 1700 年前，蜀人秦宓在回答当时的广汉太守夏侯纂的诘难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于天下乎？”^⑥秦宓所谓《本纪》，当指扬雄《蜀王本纪》一类古蜀史籍。至于这一段话中，“三皇”所指为谁，“乘祗车出谷口”详情如何，虽难以考究，但“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云云，却言而有征，所载非止一书。由此看来，秦宓之意，乃有以古蜀文明为天下先，古蜀文明为古华夏文明之源的意思了。这个结论在当时虽使夏侯纂“逡巡无以复答”，但得到的评价，却只是陈寿所谓“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⑦在今天看来，恐亦难免被视为狂怪之论。但是这些话却启迪我们注意到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在古代文献记载中神秘的内在联系，除了前已言及的岷山、岷江，至少以下二点是我们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

（一）古代文献中所传古帝王多与古蜀有神秘关系。

黄帝被视为华夏人祖，“五帝”之首，其原配即“西陵之女，是为

嫫祖”。^⑨“西陵”，即西汉武帝时所置“蚕陵县”，东晋废，其地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叠溪，^⑩正是岷江发源地。

黄帝既娶于蜀，又生子于蜀。所谓“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⑪“江水”、“若水”皆在蜀地。

玄囂青阳是否即少昊？史家所说不一，^⑫但史载少昊“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⑬揆之地望与所崇拜图腾，少昊这位古代文献中极有名的人恐亦当居于蜀地。

昌意按史籍不在帝位，但他生于蜀地，又“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颡顼”。^⑭则“五帝”中的帝高阳颡顼又生于蜀。其具体地望，则在若水之野。^⑮

且不但颡顼生于此，其子鲧亦生于此。据《竹书》，“颡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⑯

鲧之子为禹，乃生于汶山郡广柔县，^⑰其地在今四川绵阳市北川县。

夏禹之子为启，虽生于巴而不在古蜀文明中心，^⑱但他活动的地域却值得注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⑲这里“天穆之野”即颡顼产鲧的“天穆之阳”，正在“若阳”亦即若水之北，也是在蜀地西北部与岷山相邻的地区。

由上可以看出，古代文献中所传古帝王多生于古蜀地，或与古蜀有着神秘的关系。

（二）古华夏帝王多能与古蜀帝王相叠合。

黄帝与蚕丛。

如所周知，在古代文献中黄帝与其妻嫫祖都曾被作为发明了蚕桑的蚕神祭祀；当他们受到祭祀时，黄帝被称为“先蚕皇帝轩辕氏”，而那位马首女身的蚕神形象则似乎就是黄帝妻；在北方，汉魏以后故事，祀蚕神者须一律“衣青衣”。^⑳上述这些因素又都不难在

与古蜀有关的文献和传说中发现。依古蜀地的传说，古蜀王蚕丛被认为是蚕桑的发明者，因而被作为蚕神祭祀，民俗呼为“青衣神”；^④或说蚕神为女性，为帝女或“仙嫫”，民俗呼为“马头娘”。^⑤那么根据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将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所流传的蚕神祭祀诸点做一比较：

蚕陵县	{	古华夏 西陵女黄帝妻——马首女身 先蚕皇帝嫫毘氏——青衣衣(祭祀者)
		古蜀帝女仙嫫——马头娘 蚕神蚕丛王——青衣神

从上可看出，黄帝与蚕丛王二者乃是可以叠合的，而叠合的空间，就在我们已屡言之的那座神秘的岷山中。

后稷与杜宇。

后稷与杜宇相合者颇多，姑数其荦荦大者：

他们活动于同一区域。后稷死于“黑水之山”，^⑥杜宇“升西山隐焉”，^⑦所指皆在岷山山系。后稷葬在“都广之野”，^⑧杜宇建国于“郫”、“瞿上”，^⑨皆成都平原中心地带。

他们来历都神奇。后稷乃其母郊祀时履大神之迹而得孕生，实天神之子。^⑩杜宇乃“从天堕，止朱提”，^⑪其神奇自不待言。

他们有共同的神格与业绩。“后稷教民稼穡”，^⑫实为古华夏文明中农神。杜宇“教民务农”，^⑬亦为古蜀文明中农神。

他们都有一位善治水的同事。后稷时为禹，杜宇时为鳖灵。

他们都与一位出于水“原”的女性有关。后稷母曰姜原，其名当出姜水之原。^⑭杜宇妻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⑮“江源”实则汉所设江原县，即今成都附近崇州市江源镇。

他们族属同出一源。后稷母姓姜，出姜、氏二族，而二族实不可分，故古籍多连称之。^⑯

他们皆属鸟图腾。后稷生而遭弃，最后以“鸟覆翼之”而被家人视为神奇而收养之。^⑰又后稷本名“伯翳”，^⑱“翳”乃鸟在农田上飞翔之状，^⑲因此神话传说中，后稷所“潜”正“群鸟所生所解”之处。^⑳

又后稷为周之始祖，既然与鸟关系如此，实即周的图腾神，因而有“周之兴也，‘鸛 鸛 鸣于岐山’”^④之说。杜宇之前，蜀王名鱼凫（其实杜宇、鱼凫很可能为一，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展开讨论^⑤），为鸟图腾自不待言；杜宇承继其位，在郫邑或“瞿上”治理国家，“瞿”乃“鹰隼之视”，^⑥是其首都之命名乃以鸟之形象为名，因此三星堆出土之鸟形把勺，考古界多认为杜宇朝遗物。又杜宇虽未如稷以鸟命名，但是杜宇失位，乃化杜鹃，泣血催春，为蜀人怀念，其实亦远古图腾遗说。

鲧禹启与鳖灵。

鲧、禹、启在历史典籍中是直接承继的三代，作为传说中的夏开朝前后的几位关键人物（或神），在古华夏文明的形成建构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而它们与古蜀文明中的又一位蜀王——丛帝开明即鳖灵，有着神秘的对应关系。

鳖灵与鲧禹皆以治水而闻名。

鳖灵与夏禹在蜀治水的区域大体相通，涉及岷江、沱江、嘉陵江、长江（特别是巫峡地区）。

鳖灵时代洪水因龙斗崩山壅江；鲧、禹时代洪水因共工争帝崩山壅江，共工属龙图腾。^⑦

鳖灵治水与夏禹治水皆有女神相助。

鳖灵治水时妻为杜宇淫乱；夏禹治水与涂山氏野合于台桑。

鳖灵治水幻形为龟鳖；鲧以三足鳖形态没入羽渊；夏禹治水中所谓“禹步”，可能就是一种龟鳖蹒跚的步态。

鳖灵登位乃因其治水成功而受禅让；禹亦如此。

鳖灵号开明，称丛帝；鲧号崇伯；启即开。

鳖灵号开明，为神话中昆仑山守护神，形象为白虎；禹、启皆与虎有关。三者与虎有关，似反映了一种巴的文化背景。

鳖灵为荆楚之尸，浮于岷山而复活；鲧、禹皆受到楚民族极度尊崇，仅观屈赋即可了然。

鳖灵登位后,实行一系列礼乐改革,要皆不出夏、周之制;鲧、禹、启乃开启夏代举足轻重之人物(或神)。⁶¹

上述蚕丛、杜宇、鳖灵是古蜀文明中文献记载最多,亦最有建树的三位古帝王,但有趣的是,他们的形象事迹恰恰与被视为古华夏文明最关键的三个阶段(前夏、夏、周)的代表人物相叠合印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一些猜想:有夏一朝虽然迄今为止仍因材料的缺乏而显得云遮雾罩、支离破碎,但从片片断断的文献中却不难看出,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较早文献中,禹是受到最多尊崇的古帝王之一。鲧虽被列为“四凶”之一,但事实上,在《左传》、《国语》中我们却不难看到他被夏人尊崇的说法。⁶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关于黄帝的记载相对较晚,其形象真相及形成过程尚待进一步研究;后稷虽为周人祖先,但实与夏禹处同一时代;还考虑到前已指出的颛顼实亦夏人崇拜的祖神,则似乎可以说,古蜀文明乃与传说中的夏有极密切的关系。

既然如此,那么到底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的主要建构者夏朝到底孰先孰后,是什么关系呢?

如若单纯以文献典籍中所载来看,从一种北方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出发,我们即使承认了上述所讨论的现象,也还是容易得出蚕丛即黄帝,杜宇即后稷,鳖灵即鲧、禹、启的翻版的结论;很容易认为,古蜀文明中的古帝王及某些传说,不过是古华夏神话与历史传说敷衍的结果罢了。但是现在,随着成都平原一系列史前古城址的发掘,事实已说明,早在四千多年以前亦即传说中夏朝尚未开始之时,古蜀文明就已出现非止一座城邦,且考古事实亦表明这个古蜀文明曾沿着岷江、长江、汉水等流域播迁,那么,古华夏文明,或者说得准确一些,现在古代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古华夏文明,其主体部分是来源于古蜀文明的。

总而言之:古蜀文明大体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个文明主体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尚待进一步考察研究;古蜀文明形成后曾向

四方播迁，播迁的路线是古代一些著名的河流，其中长江、岷江、汉水等是目前我们所知最多的，特别是岷江、长江流域，西周以后强大起来的楚民族在对颡顼、鲧、禹等的亲近崇拜上（或说对夏的关系上），在崇拜鸟图腾上，与古蜀文明有着惊人的一致处，更加说明了古蜀文明向外播迁的重要方向；古蜀在地域与文化上与古华夏文明相隔绝大约发生在殷商时期，殷人之祖帝喾一系之后尧等没有出现于古蜀文明中，大约是一种文献上的佐证；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风格、工艺迥然殊异，则大约是一种考古上的佐证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古蜀与殷商判然划分，甚至长期为敌，^⑧最后竟参加周族军队在推翻殷纣的战斗中建立了众所周知的功勋，当有待进一步研究了。

那么成熟以后的古蜀文明是否也接受过某种外来文明的改造熏染呢？有的！反映在文献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大约就是“荆尸”鳖灵溯江而上又复活于岷山之下，甚至最后入主古蜀地的故事了。^⑨但是考古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与三星堆古城邑是在一种受到外力压迫的情况下突然放弃的，其历史下限即三星堆文化第四期，约商末周初时期。不少专家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中鳖灵取代杜宇的时期。果若是，则我们应该指出，这并非什么外来文明对古蜀地的侵入，当鳖灵携带着存留于楚民族中的夏文明因素来到古蜀地时，他当不会对古蜀文明感到陌生。毋宁说，古蜀文明乃像母亲欢迎游子回归似的张开双臂欢迎了他。鳖灵所以能在岷山下岷江中复活，所以能为相，复取代杜宇为帝而又为蜀地人民所拥戴，其神话学的深层含意正在于此，原来古华夏文明中就包含着极其浓厚的古蜀文明因素啊！因此鳖灵的复活，从神话思维的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古蜀文明的又一次苏醒！

以上我们粗略而鸟瞰式地检讨了目前成都平原考古所昭示出的古代文献新的研究课题和意义。我们认为，三星堆及成都平原上